

# 浅谈1945—1950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经济始末

曾永恒

(西昌学院 政史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1945—1950年中共的对外经济思想是积极的、灵活的。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灵活、务实的对外经济思想,后来又制订了相关的经济政策。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对外经济走向封闭、同西方隔离,这与“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外经济思想; 对外经济政策; “一边倒”

**【中图分类号】**F12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4-0073-04

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处于自我封闭,“关起门搞现代化建设”,与西方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与西方隔离。其实不然,解放前后有一段生动活泼的对外小插曲往往被忽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良好机遇。然而这时国家的前途又处于重新选择,共产党人力图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开放的国家,经过最大努力最终彻底失败,中国人民又经历四年艰苦卓绝的命运决战,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国现代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共产党人即使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代,始终牢记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以积极的姿态曾提出过利用外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设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产党人更提出了具体的“内外交流”思想、“互通有无”的和平经济政策,并试图将上述设想付诸实施,但由于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和随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西方的疯狂“封杀”和隔离,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变得异常坎坷曲折。

## 一、对外经济思想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曾明确提出初步的学习西方和对外经济的思想,虽然没有系统地提出对外经济思想而

且这些思想并不完善、并没达到成熟程度,但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海纳百川的对外开放态度和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以实现现代化的勇气和决心。

首先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论述当中得知,毛泽东对外思想是开放的,对外是有原则的。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提出对外开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他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sup>[1]</sup>1999年在湖北省襄樊市发现的、由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印、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的1947年版六卷本《毛泽东选集》中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外资来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是非常大的。”<sup>[2]</sup>

与此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各国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1946年6月3日,在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曾明确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

收稿日期:2004-12-06

作者简介:曾永恒,男,西华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现为西昌学院教师。

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解放区美国经济的发展,须有我们的同意和赞成。”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sup>(3)</sup>从而明确表达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思想。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暗示过对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和解政策。其中谈到至少在全国胜利之前,允许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在大城市存在。同时毛泽东在其报告中说:“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sup>(4)</sup>该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之一中指出:“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sup>(5)</sup>是月30日,毛泽东重新强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sup>(6)</sup>又在同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筹备会上,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断绝和蒋介石的关系,新的共产党政权就愿意和它建立外交关系,并重申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在给予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暗示的同时,我党曾通过黄华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使中美双方发生了联系以寻求中美两国关系今后合作的可能。<sup>(7)</sup>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在很多场合提出过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对外开放的思想。1944年10月29日,他同戴维斯坦及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后,将派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贸易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在沿海航行的船只。”1945年12月,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说:“我们并不反对利用外资,我们只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迎外资的。”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也曾指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实

现社会主义,但在目前不打算将它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从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他还多次强调指出:“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我们不排除,不挑衅。”<sup>(8)</sup>由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 二、对外经济政策

可以看到随着对外思想的发展,对外经济政策初见端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将中共的基本经济政策概括提炼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其中所谈的“内外交流”,主要是指在经济上,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尤其是积极发展与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关系,通过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来加速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正如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sup>(9)</sup>

1949年6月,刘少奇认为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援助,主要有:(1)经验上的援助(2)技术上的援助(3)资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是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sup>(10)</sup>强调新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离开国际援助。1950年1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去电文,提出中国应与苏联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在新疆合办企业,他说:“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sup>(11)</sup>在我方的要求下,1950年中苏签定了关于在中国新疆创办“石油股份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设想付诸实践。

在积极发展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

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利用西方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设想。刘少奇又指出:“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sup>[12]</sup>朱德也曾说:“今后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sup>[13]</sup>强调指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沟通和交流。

此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提出了“互通有无”的原则,后来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完善,逐步发展成为他主张的“和平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具体讲就是“第一,平等互利,就是不能只利自己,不利别人。平等就不是独占,要有来往;因而第二,互通有无,第三,其目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经济发展。”<sup>[14]</sup>为了宣传这一政策,他曾对日本和欧洲的客人讲,我们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这样大家可以共同发展。如果各国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国际经济合作的前途就是无限的。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新中国重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使得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增长很快。据统计,在我国1950年进出口贸易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占进口贸易额的66.2%,占出口贸易额的66.8%。<sup>[15]</sup>这一年在中国大约仍有数百家外国企业,仅英国就有200家,这些企业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sup>[16]</sup>中外经贸关系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疯狂的“禁运”和经济封锁。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财产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同年12月28日,中国政府对美的反华政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此之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对外经济来往才进入“冷战”时期。使得新中国准备在适当条件下引进西方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设想不得不暂时中断。此后,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更趋恶化,中国从西方各国那里引进技术和资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决定了新

中国对外开放、摄取外来文化历程的坎坷与复杂。

### 三、对外经济“冷战”的由来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对外经济嘎然而止?不可忽视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首先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找出它的根本原因。外部原因是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的开始,内部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被迫的“一边倒”政策。

早在重庆和谈时期,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就开始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就已怀戒心,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其基本内容为:

在政治上“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阵营一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一边倒”的政治方略做了精辟的阐释: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sup>[17]</sup>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更是直白:“‘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的的关系的问题上,还保有些幻想的人们说的。”<sup>[18]</sup>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劝解人民要“一边倒”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他说:“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

使他们战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sup>[19]</sup>

“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对此,薄一波认为:“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杀了国民党的威风。<sup>[20]</sup>“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对新中国摄取外国先进

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和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新中国的形势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暂时还不能直接通过学习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只能首先发展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关系,并积极争取他们的经济援助,推进中国现代化。

回顾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思想,说明共产党人并非头脑僵化、存在不友好的排外思想,而是认识到借鉴、学习、摄取先进的文化永远是落后国家、民族自身无法回避的选择,是国家强盛、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制定了一些相对可行的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  
 [2] 转引自《文汇报》1999年11月30日。  
 [3] 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416页。  
 [4][5][6][9][17][18][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5页,第1459页,第1461页,第1473页,第1472~1473页,第1475页,第1488页,第1496页。  
 [7][16] 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64~365页。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322、324页。  
 [10][11][1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第151页,第64页,第80~81页。  
 [13]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397页。  
 [14] 魏史言《周恩来外交思想》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9页。  
 [15]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16] 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65页。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5页。

## On Foreign Economy of CPC in 1945-1950

ZENG Yong-h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History,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615022, Sichuan)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s) foreign economic thought is active and flexible. As representatives of CPC,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put forward many active and practical opinions, and worked out relevant policy. After Korea war, China's economy being blocked from the west is related to one-side foreign policy closely.

**Key words:** CPC; Foreign Economic Thought;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周锦鹤)